

谢有顺:写作和研究都必须思考“现在”

谢有顺“出道”很早。他虽然是70后,却和60后这代批评家一起成长,相当长的时间里,他都是中国当代活跃的文学批评家中最年轻的一位。

1992年,还在读大二时的他,开始写文学评论,而且一下就在各种学术刊物发表了,大三时,他写的一篇关于先锋长篇小说的万字长文在《文学评论》发表,成为《文学评论》复刊以来年龄最小的作者。“走在路上,遇到系主任,他很远跑过来对我说,祝贺你。当时在《文学评论》上发表一篇文章是很难的,现在就更难了。”

说起这段历史,谢有顺认为自己的经历难以复制。他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的文学现场,相比80年代的金光耀眼,已经黯淡了许多,学术行业同样清冷,愿意静下心来从事文学研究的年轻人不多,这反倒让他能够被人记住。

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同路人,谢有顺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,他说,承认中国当代文学这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,同样需要胆识和勇气,“很多当代作家的作品,放在同一时期世界文学的尺度里,也是可以平等对话的”。

面对呼啸而来的新媒体、新技术对人们阅读方式和趣味的重塑,谢有顺认为,这未必不会为文学带来积极的改造。“没有谁告诉我们‘文学应该这样’,文学所作出的所有努力,就是为了告诉我们‘文学还可能是怎样’。”

新近出版的文学评论集《文学的深意》,较为全面地呈现了谢有顺近年来对当代文学的观察和思考。对当代文学有何总体判断?AI时代的文学将向何处去?谢有顺接受了现代快报记者专访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
陈曦/文 牛华新/摄
任雨风/视频



扫码看视频

大读家

读书人,写作者
与他们的思想现场



学者、评论家谢有顺

我的经历表明文学确实有过自由生长的阶段

读品:1990年你进入福建师大中文系学习,大二开始发表评论文章。能否谈谈你的文学启蒙和阅读状态?一般来说,大学生会倾向于文学创作,比如写诗、写小说,你为什么会选择写学术文章?

谢有顺:我童年生活在乡村,也是在村里读的初中,当时能够接触到的书籍很有限,尤其是文学期刊,几乎看不到。那时我所读的书籍,就连四大名著往往都是不全的,是前后掉页的那种,也根本没钱买书,甚至曾把中医的《汤头歌诀》整本背下来。真正开始了解文学是到县里读中师之后吧。最疯狂的阅读阶段是大学时代。那时成天逛书店,泡图书馆,等每一本新期刊出来。我是宿舍里睡得最晚的人,平时也很少参加集体活动,我把多数时间都用来读书了。尽管我志在研究文学,但我觉得文史哲是不分家的。我不仅读文学和文学理论,更是大量阅读哲学、历史和思想类著作。像海德格尔、萨特、加缪的著作,雅斯贝尔斯、波普尔,甚至维特根斯坦的比较晦涩的书,我也读了不少。你问我为何会选择学术研究为志业,跟这些阅读经验可能是密切相关的。

读品:你是70后,却和60后这代批评家一起成名,相当长的时间里,你都是中国当代活跃的文学批评家中最年轻的一位,你的成名之路难以复制。回头来看,这其中有什么偶然和必然的因素吗?

谢有顺:也许是偶然吧。我开始发文章时,是1992年左右了,商业和消费的力量开始深刻影响中国文学界,文学杂志举步维艰,学术是一个清冷的行业,那时愿意静下心来从事文学研究的年轻人很少。研究生的培养规模也小,同龄人的竞争就没那么激烈。而我从大学本科开始就在《小说评论》杂志上开专栏,也在其他刊物上发表了不短长文,自然就容易被别人记住。直到上

世纪末,70后一代,写小说的开始很热闹了,出现了棉棉、卫慧等70后作家群现象,写评论的同人仍然很少。70后作家群集中出版的第一套丛书《文学新人类》,还是我主编的。

当然,可能跟我一开始就关注先锋小说、关注新的文学观念也有关系。记得1992年我发表的第一篇万字长文,就是关于先锋小说,讨论的是先锋小说的语言问题,新的叙事语言是如何生成故事,又是如何消解故事的。那时,我甚至对先锋小说的转型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比如,余华的《活着》刚发表,我就看到先锋作家从之前的热衷于形式探索,到重回讲故事的路子,这里面蕴含的问题,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。回头看这段时光,虽然观点颇为稚嫩,但当时的胆量、敏锐度以及自觉的文体意识,确实助力了我较早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些风格。我跟我的研究生说过,你们该怎样发展就怎样发展,不要学我,我的成长历程是你们学不来的。我的经历,表明文学确实有过自由生长的阶段。

读品:你在90年代进入文学现场,开启了自己的批评事业,当时“文学热”已然过去,文学面临着经济大潮的冲击。你怎么比较80年代、90年代这两个年代?

谢有顺:必须承认,每个人都脱不开时代对他的影响,但另一方面,也要看到,任何对时代的粗略概括都可能是刻板的、大而无当的,总是有很多个体会从时代逃逸出来,尤其是那些无羁的思想,常常是一个例外。真正的文学不是只看时代的表象,而是要去发现个体、创造个体。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就是个人的发现。对文学而言,重要的不是时代,而是时代对无数具体个体的影响,“事件发生之后”的故事,才是时代真正的影像。

没有问题意识和现实感任何研究都是可疑的

读品:你直言文学研究界存在一条“鄙视链”,研究先秦的看不上研究唐宋的,研究元明清的看不上

研究现当代的,你指出“这种对时间的迷信是肤浅的”。这种肤浅体现在哪里?

谢有顺:我所感慨的是,很多的写作和研究,缺一点当代意识,这是致命的。真正有价值的写作和研究,都必须思考“现在”。没有人有权利蔑视“现在”。持守这个立场,就是一个作家和学者的担当。当年胡适说自己的思想受赫胥黎和杜威影响最大,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,杜威则教他“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”,“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”,我想,正是这“顾到当前”的现实感,使胡适成了那个时期中国思想界一个敏锐的触角。

钱穆说晚清中国文化的衰败,很大原因在于文化成了纸上的文化;而春秋战国时期,能迎来思想的黄金时代,得益于那时的思想有巨大的“现实感”,而不仅流于回忆和空谈。切近现实问题,切近当下,永远是新思想和新艺术的源泉。今天的作家、学者要处理好这么复杂、丰富、尖锐的当下性议题,更要有一种当代意识,有一种直面“现在”的勇气。

读品:现当代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都是一个令人焦虑的学科,它所面对的研究对象的历史十分短暂,其边界也在不断地变化。你在踏入这一学科之时,也曾有过焦虑吗?

谢有顺:我没有这种焦虑,我们从来不为一个学科而写作,我面对的问题永远是“文学”本身。如果“文学”消失,文学研究不再是“问题性学术”,而成了单一的“学科性学术”,这样的研究只是知识层面的增殖,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。严复说:“中国夸多识,而西人尊新知”,马克思说:“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,而是问题。”这些话仍然值得重温。单纯追求“多识”和“答案”的时代过去了,尤其是AI时代来临,“多识”和“答案”是最容易被AI替代的。没有“大问题”,没有“打动”,在我看来,任何研究都是可疑的。李泽厚八十年代在答记者问时说:“不写五十年以前可写的东西,也不写五十年以后可写的东西,我只为我的时代而写。”我们虽然没有李泽厚这种气魄,但“只为我这个时代而写”的自觉还是值得学习的。

读品:你在接受采访时谈到,你对沉迷于体系建构、创造“新名词”、重史论不重作品的研究风气不以为然。

谢有顺:文学研究的知识化、体系化,固然完备了学科体系建设,但在人文学科发展的过程中,过度迷信知识化和体系化,也扭曲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。体系建构代表了一种学术雄心,但过于粗疏的体系建构也可能滑向空洞化、大词化的窘迫境地。近年不断有学者站出来,强调文本细读的意义,并倡扬以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史写作观,也是出自对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纠偏;很多不充分吸纳文学批评成果的文学史书写,普遍流于文学外在知识谱系的梳理,无法有效解读作家作品,也必然难以从各种艺术变革中引出准确的文学判断。

新媒体未必不会为文学带来积极的改造

读品:你觉得中国当代文学是否存在真正的高峰作品?

谢有顺:从艺术上说,四十多年前的中国当代文学,即新时期文学开始,起点是很低的。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,在我看来,至少在诗歌、中篇小说、长篇小说、文学批评等方面的成就已不亚于现代文学甚至超过了现代文学,这应该是不难判断的事实。

现代文学时期的作家因为参与

了现代汉语的创建,见证了一种语言从出生到成熟的过程,他的重要性会更突出。而当代文学在语言比较成熟的状态下,要想有所创新,并建立起一种全新的语言风格,难度就要大得多。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漠视中国当代文学成就的借口,从现有的中文译作来看,很多当代作家的作品,放在同一时期世界文学的尺度里,也是可以平等对话的,比如苏童的一些短篇小说,艺术水准并不见得逊色于那些已翻译过来、与他同龄的西方作家。

所以我曾说,承认中国当代文学这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,同样需要胆识和勇气。尽管我还无法判断哪些作品是“高峰”,但很多作家正在攀登的阶梯上,这点毫无疑问。

读品:前不久有批评家提出,一些50后、60后作家对于当下生活的描写,表现得“非常昏聩”,对此你怎么看?

谢有顺:你要求作家的每一部作品,都要超越他之前的作品也不现实。事实上,有时候一个作家还在写,比他写了什么、写得如何更重要。像莫言、余华、格非、毕飞宇这些作家,他们一直在写,一直在文学现场,这对于读者来讲就是幸福的。至于对他们新作的争议,好还是不好,这涉及你持守何种文学价值去评价。他们也许正在换一种方式思考、认识世界。像近来莫言、余华这些作家对新媒体没有拒斥,表明他们试图去理解年轻人、亲近年轻人,这是非常好的心态。这种心态会保证一个作家走得更远。

读品:项流作家纷纷走进直播间或开设视频号,作家需要不过度阐释自己而只让作品说话吗?

谢有顺:有视频号后,他们看起来和时代有一种新的交往方式,但骨子里、写作上一定有自己一直不变的东西。变化是一个客观事实,这种影响有时也是积极的,我们不需要过度去焦虑、抗拒。不要过度夸大这种媒介变化带给人的消极影响,也要认识到它的积极方面。比如新媒体时代传播方式的变化、阅读趣味的变化,未必不会为文学带来积极的改造。一百多年前,小说还被认为是未流、小技,不登大雅之堂,但不过短短几年时间,经过鲁迅等现代作家的努力,小说迅速成了一个显赫的文体。没有谁告诉我们“文学应该这样”,文学所做出的所有努力,就是为了告诉我们“文学还可能是怎样”。如果文学的可能性被关闭了,那才是文学的悲剧。



谢有顺

福建汀州人。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兼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,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,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。出版有《文学的深意》《成为小说家》《散文中的心事》等著作二十部。曾获冯牧文学奖等。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。入选全国文化名家暨“四个一批”人才、教育部“长江学者”特聘教授等。